

## 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演变及其治理困境<sup>\*</sup>

马成文

**摘 要：**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布局主要由两条制度逻辑不同的安全轨道构成：一是高度制度化且深受美国国内政治塑造的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安全关系；二是依托双边防务合作协议、基地准入和军售互操作维系的美国与海合会安全伙伴网络。二者共同构成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核心支柱。基于“庇护—依附”视角，本文认为，美国构建的双轨安全结构存在显著的制度分化与治理张力。美以特殊安全关系表现为高度制度化的“一对一”深度庇护，但美国面临约束盟友能力下降和治理成本上升的困境；美海安全伙伴网络则呈现更具交易性的“一对多”轮辐式安排，海湾国家因对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而强化战略自主。两类风险在加沙冲突外溢、美以伊对抗升级等危机中相互传导，暴露出美国跨轨道危机协调的结构性张力。研究表明，美国中东安全治理正由相对稳定的分层庇护转向更具议题化、交易化和再平衡特征的调整过程，中东安全结构也由此进入新一轮重组。

**关 键 词：**美国中东政策；双轨安全结构；庇护—依附关系；美以特殊关系；美海安全网络

**作者简介：**马成文，博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副教授（银川 750021）。

**文章编号：**1673-5161(2026)05-0092-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sup>\*</sup>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文明西传的路径与影响研究”（22&ZD251）的阶段性成果。

自 21 世纪以来,美国主要依托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安全关系(下文简称“美以特殊安全关系”)与美国与海合会安全伙伴网络(下文简称“美海安全伙伴网络”)两条安全轨道推进其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前者制度化程度较高<sup>①</sup>,后者表现为以防务合作、基地准入和军售操作维系的安全伙伴网络。二者在制度层级、承诺与治理工具上存在显著差异,却共同构成美国分层庇护与秩序塑造的重要基础。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地区安全投入方式变化与危机条件下阶段性军事增投并存,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持续上升,加沙冲突外溢与美以伊安全对抗升级,双轨安全结构的制度分化与治理张力日益凸显。

围绕上述现象,学界已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关于美以关系,有研究强调其例外性来源于冷战时期积累的战略资产、价值认同与国内政治结构,其高度制度化使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呈现长期锁定倾向<sup>②</sup>。也有学者指出,美以关系在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中处于中枢位置,其安全协同程度明显高于美国与其他地区伙伴<sup>③</sup>。关于美海关系及海湾国家外交行为的研究<sup>④</sup>,近年研究更多突出在美国霸权式微与地区竞争加剧背景下,海湾国家议价能力与战略自主性持续上升<sup>⑤</sup>。此外,从联盟理论与庇护—代理关系视角出发,有研究揭示非对称联盟中存在“牵连—抛弃”困境<sup>⑥</sup>,以及“安全—自主交易”的结构性逻辑<sup>⑦</sup>。主导国提供安全往

① 美以关系的“高度制度化”,主要指其通过美国国内立法(如《谅解备忘录》)、确保“质量军事优势”原则及系统性外交庇护等机制,形成了极为稳固且单向的资源输送与政策承诺结构。这与美国在欧洲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等多边条约构建的、强调成员国权利义务对等的联盟制度化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pp. 156–162; 汪舒明:《中东安全格局变化下犹太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影响——基于即时文献的研究》,载《西亚非洲》2026 年第 1 期,第 106–133 页。

②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汪舒明:《中东安全格局变化下犹太社团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影响——基于即时文献的研究》,第 106–133; 孙德刚、钟灵等:《当代中东地区联盟类型的理论与案例研究》,塔什干:丝绸之路出版社 2025 年版。

④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1, 1972, pp. 91–113; Robert R. Kaufman, “The Patron-Client Concept and Macro-Politic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6, No. 3, 1974, pp. 284–308.

⑤ 田文林:《中东地缘冲突与地区安全秩序重塑》,载《当代世界》2025 年第 3 期,第 54–61 页;赵婧、刘中民:《霸权式微与战略自主: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地区体系的变革》,载《国际展望》2025 年第 17 卷第 5 期,第 86–107 页。

⑥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往伴随约束能力递减,被庇护者则可能通过议程锁定反向影响主导国政策<sup>①</sup>。

现有研究虽对美以或美海单一安全关系已有深入探讨,但尚缺乏对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整体性、比较性与动态性分析。这尤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少将两类关系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系统考察其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如何塑造不同的行为模式,并引发关联性的战略后果;二是对美海关系的制度属性仍存模糊地带,需在“非对称安全伙伴网络”的定位下予以澄清。为此,本文引入“庇护—依附”理论框架,旨在从关系动态与治理逻辑的视角,系统剖析该双轨结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困境。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与地区自主性提升的背景下,双轨安全结构内部的“庇护—依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动态演变,如何催生当前的治理困境?

## 一、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形成

美国在中东构建主导地位的过程,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基于“庇护—依附”关系的制度设计。庇护关系强调大国与小国围绕安全、资源和政治支持形成的不对等交换关系,小国通过寻求外部保护以降低体系风险并平衡安全成本<sup>②</sup>。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中东安全结构的主要庇护者,通过差异化战略安排塑造了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不同依附关系。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形成,正是美国依据不同战略目标和地区功能,对两类伙伴进行制度吸纳和安全整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两条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均受美国主导的安全轨道。

### (一) 美以特殊庇护关系的构建

美以特殊庇护关系的形成,是美国在冷战背景下,为其中东战略塑造一个高度忠诚且高效的战略资产<sup>③</sup>的主动选择。其目标超越了单纯的安全交换,旨在通过深度绑定,将以色列整合为美国遏制苏联、维持地区均势的核心支点。这一特殊关系的奠基,是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美国迅速予以承认,奠定了双边关系的基础。但其作为一种经典的、权力高度不对称的“庇护—依附”关系得以真正确立,是以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为关键节点的,此次危机是对美以关系初始权力结构的极限压力测试,其结果清晰界定了庇护者与依附者的角色边界。当以色

---

① 陈翔:《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 年第 5 卷第 3 期,第 47-77 页;凌胜利:《联盟研究:理论与案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2 年版。

② 参见陈翔:《理解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第 47-77 页。

③ “U. S. Military Chief Says Israel is a Strategic Asset to the U. 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March 12, 1984, <https://www.jta.org/archive/u-s-military-chief-says-israel-is-a-strategic-asset-to-the-u-s>.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6 日。

列联合英、法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违背了美国拉拢阿拉伯世界、防止苏联渗透的全局战略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了强硬反应,在联合国联对苏联推动制裁决议,并以切断援助相威胁,最终迫使以色列完全屈服。这场危机以最鲜明的方式确立了双边关系初期的基本范式,即美国是掌握着资源分配与纪律执行权的绝对庇护者,以色列则是生存与安全高度依赖前者、且必须服从其战略安排的从属性依附者。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美以关系在冷战格局深化中,被重新赋予战略价值并迅速制度化,但其美国主导、以色列服从的庇护依附内核在初期得以延续。1962年,肯尼迪总统将美以关系与美英“特殊关系”<sup>①</sup>相提并论,标志着其在美国外交序列中政治定位的显著提升。

此后,随着中东成为美苏竞争的重要区域,以色列逐渐被美国视为维持地区均势、遏制苏联影响的重要战略支点。美国通过多维度、制度化的投资,将以色列塑造为一个深度嵌入自身战略体系的特殊依附者。在价值认同的叙事建构方面,美国系统地将以色列塑造为“中东民主堡垒”<sup>②</sup>,这一意识形态标签将双边关系提升至价值观同盟的高度,为其国内国会、舆论、亲以团体等提供了超越短期利益的政治与道德支持基础,增强了庇护关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在战略资产的功能锁定方面,以色列在数次中东战争中展现的军事效能与坚定的亲西方立场,使其在美国的冷战棋局中,从一个地缘负担转化为具有极高价值的“战略资产”,对抗苏联的地区代理人。在国内支持与制度锁定方面,美国通过十年期《谅解备忘录》等机制化的巨额军事援助、确保“质量军事优势”(QME)<sup>③</sup>的排他性技术转让,以及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系统性外交庇护,美国将对以支持固化为一项具有高度国内政治刚性与制度惯性的长期政策。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美以关系逐渐超出一般安全合作范畴,形成了高度制度化、长期锁定且具有明显例外性的特殊安全关系。美国与以色列当前的特殊关系,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

---

① 关于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的定义,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个在1946年3月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著名演讲《铁幕》时使用该表述的人。他在演讲中描述了美英两国在二战期间及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联系。这一术语后来被用来描述美国与其他外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政界,这一术语最早由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使用。此后,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都重申了“特殊关系”这一术语。参见储永正:《美以军事外交关系研究——基于军事援助的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② 参见孙德刚、钟灵:《当代中东地区联盟类型的理论与案例研究》,塔什干:丝绸之路出版社2025年版,第171页。

③ “质量军事优势”(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 QME)是美国长期对中东军售的重要原则,其核心在于确保以色列获得比周边阿拉伯国家更先进的武器装备。该原则可追溯至冷战时期,并于2008年写入美国法律。

是先天注定的<sup>①</sup>。

因此,美以特殊庇护关系的形成,本质上是美国运用其庇护者权威,通过惩戒立威与制度赋能相结合,为服务其全球战略而精心培育的一个“一对一”深度庇护结构。在形成阶段,其权力流向是清晰且由美国单向主导的。

**(二) 美国与海合会国家工具性庇护网络的成型**

与美以关系的战略绑定不同,美国在海湾地区构建安全网络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能源安全、保障战略通道以及维持地区力量投送能力,其性质更具有工具性和交易性。美海安全伙伴网络的形成,是美国作为外部庇护者,根据地区权力变化和自身战略需求,通过双边防务关系逐步建立的“轮辐式”安全交换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退出苏伊士以东地区后,美国开始承担海湾地区主要外部安全提供者角色,并通过“双柱政策”<sup>②</sup>等安排扩大地区影响。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海湾安全的介入。美国提出“卡特主义”<sup>③</sup>,将维护海湾安全提升至重要战略承诺。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并通过基地准入、军事部署和军售合作,将临时性安全存在转化为制度化安全网络。该网络的运作遵循清晰的“安全—资源”交换逻辑(见表 1)。在此工具性庇护框架下,美国作为网络轴心,提供对主要地区对手伊朗的战略威慑、高端武器的供给以及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背书。作为回报,海湾各君主国向美国提供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使用权、确保石油以美元计价和稳定供应、在地区事务上予以配合,并通过巨额军购合同支付“保护费”。与美以关系不同,美海网络缺乏深厚的价值认同与情感纽带,其稳定性更直接地依赖于对共同威胁,如伊朗等的认知和即时的利益计算,是一种典型的、条件可变且可替代性较高的“一对多”轮辐式庇护安排。

**表 1 美国—海合会六国安全伙伴网络的主要制度基础**

| 国家 | 制度支点                | 主要时间节点<br>(协议化依据) | 核心网络功能           |
|----|---------------------|-------------------|------------------|
| 巴林 | 防务合作协议(DCA)+ 第五舰队驻扎 | 1991 年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 海上安全支点、基地准入与联演机制 |

①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斯蒂芬·M. 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② 王京烈:《整体考察美国的中东政策(上)》,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8 页。

③ 卡特主义是美国总统卡特在 1980 年 1 月 23 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一项对海湾地区的政策声明,主要内容是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和阿富汗的动乱作为借口,谋求实现苏联长期以来企图获得一个温水港的目标,并宣称任何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打退这种进攻。

(续表)

| 国家  | 制度支点                                                               | 主要时间节点<br>(协议化依据) | 核心网络功能             |
|-----|--------------------------------------------------------------------|-------------------|--------------------|
| 科威特 | 防务合作协议(DCA)+战时驻军框架                                                 | 1991年9月19日签署DCA   | 联合作战平台、战区保障与军备采购   |
| 卡塔尔 | 防务合作协议(DCA)+乌代德基地                                                  | 1992年6月达成DCA      | CENTCOM空中枢纽、力量投送节点 |
| 阿联酋 | 防务合作协议(DCA)+高端军售互操作                                                | 1994年签署防务合作协议     | 防空反导协作、联训与装备互通     |
| 阿曼  | 设施准入协议(Facilities Access Agreement)+港口支点                           | 1980年签署设施准入协议     | 霍尔木兹通道安全、战略补给支点    |
| 沙特  |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Agreement Concerning 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军售和训练体系 | 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 能源与安全交换、区域威慑支柱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U. S. Department of State 及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等公开资料整理。

（三）形成阶段的非对称治理与平行主导逻辑

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的中东双轨安全结构展现出了显著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根植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所拥有的、近乎垄断性的权力资源。凭借这种优势,美国为其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设计并落实了两套截然不同但并行不悖的治理模式。主导国美国根据不同附属行为体的特性与自身的战略需求,定制差异化的权威关系与治理契约,以此在维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管理不同的合作成本与风险。美国对以色列实施的是一种渗透式“一对一”深度庇护治理。这种治理远超简单的安全交换,它意味着美国的安全承诺、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深度介入了以色列的国家生存与社会发展,几乎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美国的支持是制度化且具有预期性,以至于以色列在制定长期国防与外交政策时,可以将美国的援助作为一个稳定的已知变量纳入计算。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其“例外性”和“无条件性”,“对以政策将进一步成为美国极化政治下的党争议题”<sup>①</sup>。尽管在决策层内部时常存在激烈辩论,但公开的、制度化的支持框架始终保持坚固。这种深度绑定,使美国在理论上对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潜在影响力,但同时也将自己与以色列的安全状况紧密捆绑在一起。相比之下,美国对海湾国家主要采取轮辐式“一对多”工具性治理。美国通过分别建立双边防务关系,将

<sup>①</sup> 汪舒明:《安全危机下美国犹太社团与美以同盟关系的管理和塑造》,载《国际关系研究》2026年第1期,第103页。

海湾国家纳入以基地准入、军事合作和武器供应为基础的安全网络。该模式避免了类似北约第五条那样的正式联盟的制度约束,使美国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战略价值和地区形势调整安全投入,同时保持对海湾安全秩序的主导权。

在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稳固时期,两条安全轨道形成了功能互补的双轨庇护格局。以色列作为美国地区战略支点,发挥军事制衡作用;海湾国家则通过能源供应、基地准入和力量投送支持服务于美国地区布局。美国凭借强大的资源供给和协调能力,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庇护关系之间维持相对稳定的平衡。

这种结构的运行依赖于美国持续提供可信安全承诺,以及其作为核心庇护者协调不同伙伴利益的能力。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分别获得安全保障与政权稳定支持,但双轨结构本身也内含制度差异和治理张力。一旦美国主导能力或承诺可信度下降,双轨之间内在的制度差异与治理张力便将显现,原有平衡便可能受到冲击。

## 二、双轨安全结构的非对称治理机制与演变

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在形成阶段表现为美国主导下的平行庇护格局,但随着 21 世纪以来美国战略调整、地区力量结构变化以及安全环境演变,其内部平衡逐渐发生变化。原有以美国为核心的“庇护—依附”关系在两条轨道上呈现出不同演变方向。在美以轨道上,长期制度化支持和美国国内政治嵌入推动以色列影响美国政策议程,使“一对一”深度庇护关系出现“反向塑造”<sup>①</sup>趋势。在美海轨道上,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增强,促使海湾国家通过战略自主和伙伴多元化进行再议价,推动“一对多”工具性网络向更加条件化、交易化方向调整。

### (一) 美以渗透式“一对一”庇护与反向塑造

美国对以色列的治理模式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一对一”庇护关系,其运行逻辑已超越传统安全交换,呈现出战略嵌入和制度锁定特征<sup>②</sup>。这种关系并非单向塑造,而具有双向嵌入特点: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安全承诺保障以色列生存与发展,以色列则凭借战略价值、国内政治影响和议程设置能力反向影

---

① 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反向塑造”,是指被庇护者(以色列)的行为反客为主地重塑庇护者(美国)的中东政策议程。具体是以色列及其国内支持者通过议程锁定与议题框定,使美国决策者将以色列的安全偏好影响美国自身战略目标,从而出现“小国驱动大国”的政策倒置现象。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7, pp. 156–162.

② “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222, May 28, 2025, p. 5, [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products/RL/PDF/RL33222/RL33222.35.pdf](https://www.congress.gov/crs_external_products/RL/PDF/RL33222/RL33222.35.pdf). 上网时间:2025 年 5 月 12 日。

响美国中东政策。因此,美以特殊安全关系既是一种深度庇护结构,也是被庇护者可能影响庇护者政策选择的特殊关系。这也意味着,美以关系表面上的“一对一”庇护,往往伴随着被庇护者对庇护者政策议程的“反向塑造”。这种特殊安全关系主要通过军事援助、外交护航与战略协同得以制度化展开,其深度与广度在美国全球安全关系体系中具有显著例外性。

美国长期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截至 2025 年 5 月,美国累计向以色列提供的双边援助和导弹防御资金近 1,750 亿美元(见表 2)。并通过十年期《谅解备忘录》和“质量军事优势”(QME)原则,将对以支持固化为长期政策承诺。截至 2025 年 4 月,美以之间仍维持数百项活跃军售项目,总价值约 392 亿美元,涵盖 F-35 战斗机、CH-53K 重型运输直升机、KC-46A 空中加油机及精确制导武器等<sup>①</sup>。

表 2 美国对以色列援助数据 1946~2025(CRS 汇总) (单位:百万美元)

| 年份        | 军事援助        | 经济援助       | 导弹防御       | 合计          |
|-----------|-------------|------------|------------|-------------|
| 1946~2020 | 104,506.200 | 34,347.500 | 7,411.409  | 146,265.110 |
| 2021      | 3,300.000   | —          | 500.000    | 3,800.000   |
| 2022      | 3,300.000   | —          | 1,500.000  | 4,800.000   |
| 2023      | 3,300.000   | —          | 500.000    | 3,800.000   |
| 2024      | 6,800.000   | —          | 5,700.000  | 12,500.000  |
| 2025      | 3,300.000   | —          | 500.000    | 3,800.000   |
| 总计        | 124,506.200 | 34,347.500 | 16,111.409 | 174,965.110 |

资料来源:“U. S. Foreign Aid to Israel: Overview and Developments since October 7, 2023,”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L33222, May 28, 2025, p. 1.

相较之下,海湾国家获取美制装备通常需接受逐案审查、终端用途监控、技术降档与部署限制,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还可借助“莱希限制”<sup>②</sup>及相关法律条款,以人权或战事为由冻结已签合同。同时,美国不仅向以色列提供成品武器,还长期支持其反导系统联合研发,如“铁穹”“大卫投石索”和“箭”式反导系统<sup>③</sup>,

① “U. 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5, 2025,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israel>,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26 日。

② “莱希限制”(Leahy restrictions)是美国对外安全援助中的重要法律约束工具,允许行政和国会以人权为由限制对特定对象的军事援助。

③ 储永正:《美以军事外交关系研究——基于军事援助的考察》,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9-120 页。

并允许部分军事援助资金用于本国国防工业发展,进一步强化其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这种例外性安排在美国对外安全关系中具有鲜明特殊性。

在外交层面,美国长期为以色列提供制度性护航。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库统计,截至 2024 年底,美国自 1946 年以来累计行使否决权约 90 次,其中相当部分集中于巴以冲突及以色列相关议题,涵盖定居点建设、军事行动和东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sup>①</sup> 有关数据统计 49 次之多<sup>②</sup>,部分统计甚至认为,这一数字高达 45 次<sup>③</sup>,甚至 53 次<sup>④</sup>。还有统计指出,仅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美国就可能动用了多达 12 次否决权来阻止针对以色列的批评性决议<sup>⑤</sup>。这种外交庇护强化了美以关系的特殊性,也削弱了美国通过外交压力约束以色列政策行为的能力。由此,美以关系逐渐形成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深度庇护结构。同时,美国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演和导弹防御合作不断深化双方战略协同,形成高度嵌入的安全技术共同体。如美以定期举行“杜松眼镜蛇”等高级别联合军演,演练一体化弹道导弹防御,这种规划协同水平几乎达到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级别。<sup>⑥</sup> 美国借助《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部分海湾国家关系正常化,为情报共享、技术合作及战略协调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但这也在相当程度上绕开巴勒斯坦问题,并加剧了相关矛盾。<sup>⑦</sup>

然而,这种制度化庇护并未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依附,反而催生出“反向

---

① “UN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s & Outcomes Tables: Vetoes,” United Nations, Dag Hammarskjöld Library, <https://research.un.org/en/docs/sc/quick/veto>,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6 日。

② “美国在安理会否决了 49 项有关占领的决议……‘外交掩护’,”(阿拉伯文),阿拉比第 21 网,2024 年 11 月 21 日, <https://arabi21.com/story/1641841/49>,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6 日。

③ M Ashraf Siddiqui, “US Vetoed UNSC Majority Members Resolution On Palestine Full Membership; 46th US Veto Favouring Israel,” *Asian Telegraph Qatar*, April 19, 2024, <https://asiantelegraph.net/current-affairs/us-vetoed-uns-majority-members-resolution-on-palestine-full-membership-46th-us-veto-favouring-israel/>.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6 日。

④ “A History of the US blocking UN Resolutions Against Israel,” *Al Jazeera*, May 19,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a-history-of-the-us-blocking-un-resolutions-against-israel>,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6 日。

⑤ “UN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s and Outcomes Tables: Vetoes,” *United Nations*, Dag Hammarskjöld Library, <https://research.un.org/en/docs/sc/quick/veto>, 上网时间:2026 年 1 月 26 日。

⑥ 孙德刚、钟灵等:《当代中东地区联盟类型的理论与案例研究》,第 178-179 页。

⑦ Emily Sork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Culmination of a Decades-Long Normalization Process between Israel and the UA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nors Thesis), April 2, 2021, <https://ssrn.com/abstract=4378314>, 上网时间:2026 年 2 月 20 日。

塑造”现象。长期的资源倾斜和政治绑定,使以色列及其美国国内支持力量能够通过国会政治、社会动员和政策游说影响美国决策,使美国在部分中东议题上难以完全按照自身战略目标调整政策。<sup>①</sup>这使得美国作为“庇护者”的惩戒权威被大幅削弱,而以色列作为“依附者”的议价能力和行动自由度则空前增强。特别是在伊核问题、耶路撒冷地位以及巴以冲突等议题上,以色列均曾通过国内政治渠道影响美国政策方向,也导致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严重偏袒以色列的巴以政策,使巴勒斯坦方面对美国存在严重不信任”,巴勒斯坦方面甚至公开认为美国已失去“公正调解人”的地位。<sup>②</sup>这类高度倾斜的政策取向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美以关系中的主动性,也持续抬升了美国在相关危机中的卷入风险。“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引发的严重中东安全危机,改变了拜登政府中前期美以关系下滑的轨迹,美以同盟关系由此重振,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得到进一步强化。”<sup>③</sup>同时,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美以特殊关系“将继续发展,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内在困境”<sup>④</sup>。这种现象在2025年美以伊“12日战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以色列在美国帮助下“‘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并“通过拓展战略纵深建立‘大以色列’”。<sup>⑤</sup>“美国近乎无条件的袒护助推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践行”,而“随着以色列‘绝对安全观’的极化和美以‘特殊关系’的持续,中东仍将面临复杂难解的安全困境和艰巨挑战”<sup>⑥</sup>。

因此,美以“一对一”庇护关系的演变关键不在于安全资源投入的变化,而在于内部权力结构的转变。从苏伊士危机时期美国能够有效约束以色列,到如今以色列通过美国国内政治渠道、议程设置和制度化协同影响美国政策,美以关系逐渐出现反向塑造趋势。美国在获得战略收益的同时,也日益受到盟友安全议程的牵制,部分削弱了作为庇护者的政策主导能力。这种关系异化正是美以轨道演变的核心,也是双轨安全结构失衡的重要起点。

## (二) 美海轮辐式“一对多”治理与战略调适

与美以特殊安全关系的“一对一”深度庇护不同,美国对海合会国家采取的

① 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p. 112-168, 311.

② 刘中民:《从特朗普到特朗普: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议题及其前景》,载《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1期,第89页。

③ 汪舒明:《安全危机下美国犹太社团与美以同盟关系的管理和塑造》,第103页。

④ 倪桂桦:《当前美以特殊关系的特征与困境》,载《国际观察》2025年第2期,第129页。

⑤ 牛新春、唐志超、郭长刚、孙德刚:《中东地缘政治演进与地区秩序重构》,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6年第1期,第22页。

⑥ 李绍先:《以色列“绝对安全观”与中东地区安全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2期,第68页。

是“一对多”轮辐式安全治理模式(见图 1)。美国作为核心节点,通过双边防务协议、基地准入、军售合作和军事协调机制,将海湾国家纳入以自身为中心的安全伙伴网络。该模式并未形成类似正式联盟的集体防御机制,而是依靠分散化双边关系维持美国对海湾安全秩序的主导。美海安全伙伴网络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交易性,其基础在于“安全—资源”交换。海湾国家通过提供军事基地、能源保障、军购市场和政策协调,换取美国的外部安全支持、高端武器供给和政权安全保障。与美以关系不同,美国对海湾国家的安全供给主要依赖防务合作和市场化交易,其稳定性更多取决于双方对战略利益和地区威胁的共同判断。如,2025 年美国与沙特签署大规模长期军售协议,并讨论向沙特提供包括高端战机在内的安全合作安排<sup>①</sup>,但其本质仍是建立在支付能力、政治条件与战略协调基础上的交易性合作,而非无条件的安全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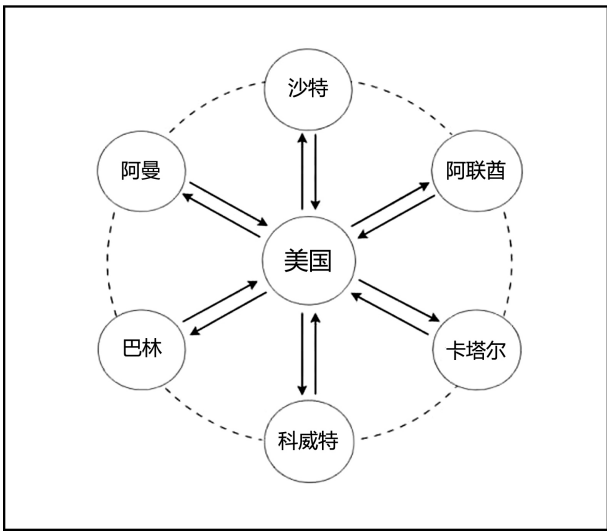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对海合会国家的“一对多”轮辐式安全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这种轮辐式结构赋予美国较强的政策调节空间。美国与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分别建立安全联系,并通过军售审查、技术限制和外交压力维持对伙伴行为的影响。例如,2021 年美国曾以“疑似中国军事设施”为由向阿联酋

<sup>①</sup> “US-Saudi Strategic Pact Formalised as Trump Backs F-35 Sale to the Kingdom,” *IntelliNews*, November 19, 2025, <https://www.intellinews.com/us-saudi-strategic-pact-formalised-as-trump-backs-f-35-sale-to-the-kingdom-412295>,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20 日。

施压,相关中方项目随后被叫停<sup>①</sup>;沙特与俄罗斯围绕 S-400 的接触,也在美国制裁威慑和地区安全平衡考量下未能推进<sup>②</sup>。在这种受约束的庇护关系下,海湾国家虽然持续依赖美国提供外部安全保障,但其政策自主空间也始终受限。在这种轮辐式“一对多”治理结构下,美国一方面能够通过双边防务关系维持对海湾安全秩序的主导,另一方面也始终保留对安全承诺的调节权。海湾国家虽然依赖美国提供外部保护,但其安全关系并非无条件承诺,而是在美国战略利益框架下运行的条件性安排。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美海安全伙伴网络的稳定性受到美国战略调整的冲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战略收缩、2019 年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的有限回应,以及美国对中东投入意愿下降,美国希望用高度节约资源的方式保持对重要地区的影响力,希望通过划定“红线”等方式慑止对手的某些行为。<sup>③</sup>美国的战略收缩并非退出,而是一种成本压缩式的存在维持。这种成本的算计使海湾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直接动摇了它们对“庇护者”安全承诺可信度的根本信任。同时,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日益明显的偏袒,特别是 2023 年加沙冲突以来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公正安全提供者”的形象,使海湾国家怀疑在关键时刻自己是否会成为被牺牲的选项。

面对美国承诺的弱化与不确定性,为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sup>④</sup>,海湾国家逐渐推动战略调适,通过多元伙伴关系和自主能力建设降低对单一庇护者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尽管国防现代化仍离不开美国装备,但海湾国家积极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并尝试从欧洲、俄罗斯乃至中国采购武器,实现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在经济与战略层面,“向东看”成为显著趋势,沙特、阿联酋等国深化与中国在能源、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这既出于经济发展需求,也带有战略平衡的意涵。在数字化新时代,海湾国家成为美国建立全球数字霸权的关键伙伴,沙特、阿联酋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多数海湾国家在转型发展特别是科

① “Secret Chinese Port Project in Persian Gulf Rattles U. S. Relations With U. A. 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9, 2021, <https://www.wsj.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us-china-uae-military-11637274224>,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22 日。

② “Saudi Arabia Has No Interest in the S-400, Says Russian Industry Official,” *Defense News*,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defensenews.com/digital-show-dailies/dubai-air-show/2021/11/16/saudi-arabia-has-no-interest-in-the-s-400-says-russian-industry-official/>, 上网时间:2025 年 11 月 22 日。

③ 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1 页。

④ 田文林:《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中国特色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4 期,第 56 页。

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安全领域仍依赖美国,在经济领域仍倚重油气‘地租经济’。”<sup>①</sup>在地区外交上,海湾国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自 2015 年萨勒曼任沙特国王以来,沙特在推行激进地区外交政策受挫后转向维持温和稳健的地区外交路线,<sup>②</sup>2023 年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正体现了海湾国家主动塑造地区环境、拓展战略空间的趋势。

海湾国家的战略调适迫使美海关系进入一个条件化重构的新阶段。美国已难以仅凭安全承诺换取海湾国家的全面配合,而需要通过军售、投资、技术合作等多领域利益交换维持影响力。美国试图以军售、情报合作为杠杆,要求海湾国家在 5G 网络建设、港口投资等领域配合其遏制中国的战略。美国认为,中国在海合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对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挑战,但由于无法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竞争,美国采用胁迫性外交策略,迫使海合会国家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sup>③</sup>然而,这种胁迫性外交效果有限,海湾国家普遍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而是更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的平衡策略,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保持独立自主,从而使自己成为全球政治的一支独立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传统的“石油换安全”基石也已不复存在。<sup>④</su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海湾国家在双边关系中的话语权持续上升,美国对海湾国家的支持已不再是理所当然,而越来越需要通过利益交换与战术性交易来加以维系。这意味着,美国为维持其海湾安全网络所需支付的成本正在上升,而其所能获得的服从度却在下降。关系模式正从过去的“强庇护—弱议价”转向“弱庇护—强议价”的动态博弈。

因此,美海“一对多”治理结构的演变,关键在于海湾国家从被动、受约束的依附者,向主动、寻求多元保障的再议价的角色转变。驱动这一转变的,既是美国庇护可靠性下降的推动力,也是全球化与多极化背景下其他大国提供替代性选择的吸引力。持续的巴以冲突、新一轮美以伊对抗的升级,特别是卡塔尔遭袭事件所暴露的美国在协调不同盟友利益时的选择性,都在加剧海湾国家的不安全感,并进一步刺激其战略自主的冲动。痛定思痛,海湾国家最需要做的,就是

---

① 王林聪:《大国竞争下中东局势新变化与中国—中东合作》,载《当代世界》2022 年第 10 期,第 41 页。

② 刘中民:《从单边安全到共同安全:冷战后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进化》,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73 页。

③ 邹志强、孙德刚:《“安全化”“去安全化”:中美在中东的“新基建”博弈透视》,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6 期,第 50 页。

④ 牛新春、唐志超、郭长刚、孙德刚:《中东地缘政治演进与地区秩序重构》,第 6 页。

重新思考将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是否可靠。大量事实表明,依附性发展越走越窄,战略自主才是出路。尽管海湾国家在安全上短期内仍无法完全脱离美国体系,但其行为已深刻改变了美海关系的性质。这个网络并未瓦解,但其运行逻辑已从美国单方面提供保护、海湾国家服从的条件,转变为双方在更多议题上进行复杂交易和相互测试底线的新模式。这标志着美海轨道正朝着一个更松散、更功利、也更不稳定的方向演变。

### 三、双轨结构失衡引发的治理困境

美国构建双轨安全结构的初衷,是通过差异化庇护安排整合地区伙伴、维持地区主导,并降低治理成本。然而,随着两条安全轨道在 21 世纪后的非对称演变,该结构原有的平衡逐渐受到冲击。美以关系因深度制度绑定和国内政治嵌入出现反向塑造趋势,美国对盟友行为的约束能力下降;美海关系则因美国承诺弱化和海湾国家战略调适,逐渐转向条件化、交易化运行。两种方向相异的演变共同削弱了美国协调双轨关系的能力,使原本作为地区治理工具的双轨安全结构逐渐转化为自身的治理困境来源。

#### (一) 承诺困境: 美以约束失灵与美国战略自主受损

在“庇护—依附”关系中,庇护者向依附者提供安全、资源等支持,其根本目的在于换取后者的战略服从与政策协调,并保留通过奖惩手段维持关系的能力。然而,在美以特殊安全关系的演变中,这种基本的交换逻辑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美国对以色列长期、制度化且近乎无条件的深度庇护,非但未能巩固其作为庇护者的约束权威,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反噬了自身的政策自主性。这种承诺困境的核心在于: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安全承诺,已从一种可调节、附条件的战略投资,异化为一种受到国内政治深度约束、且被盟友反向锁定的战略负担。这使得美国在关键时刻,既难以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单边行动,又不得不为其行为的地区性后果承担主要成本与道义责任。

庇护关系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庇护者手中奖惩工具的效力。但在美以关系中,美国最主要的奖赏工具,随着财政援助、军售特权与外交护航逐步固化为常态化安排,早已通过十年期《谅解备忘录》等机制固化为自动拨付的常规项目。这种提前承诺使得援助本身丧失了作为实时政策杠杆的调节功能。当以色列在定居点扩建等议题上采取违背美国公开倡议的行动时,华盛顿几乎无法以暂停或削减援助相威胁,因为此举将立即引发国内强大的政治反弹。结果,美国作为庇护者,其手中的“大棒”日益钝化,而以色列作为依附者,却获得了凭借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来自我保护的“盾牌”。美国对以色列的深度支持并非战略必然,而

是政治动员的结果,而且这一关系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累积了对美国自身不利的安全后果。<sup>①</sup> 美国在美以关系中原本可以运用的条件性支持工具不断钝化,关系内部的奖惩结构趋于失衡。安全供给不再稳定转化为盟友顺从,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为以色列扩大政策自主提供了制度支撑,使美以关系在运行逻辑上由传统的“庇护—依附”关系逐步滑向反向塑造格局,即美国不仅难以有效约束盟友行为,甚至在若干敏感议题上不得不承担其单边政策外溢的战略成本。

这种约束机制的失灵,使得美国在中东的核心政策倡议屡屡受挫,凸显了其战略自主性的严重受损。自 2000 年戴维营会谈以来,无论是克林顿政府倡导的“两国方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冻结定居点”要求,还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世纪协议”,美国多次尝试通过调停推动巴以和谈,但在关键领土与安全安排上始终难以促使以色列作出实质性让步。以色列政府多次以国内政治压力、国家安全威胁等理由拒绝执行美方建议,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考量,也往往难以采取削减援助、延缓军售等惩罚性措施。以色列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张,对巴勒斯坦权利的侵蚀不断引发地区与国际社会批评,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巴勒斯坦民众、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盟友中的信誉。

伊核问题更是“承诺困境”的集中爆发点。奥巴马政府推进伊核协议(JCPOA)期间,美以围绕协议的公开分歧一度使双边关系跌至低谷。<sup>②</sup> 2015 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未经白宫同意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直接动员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反对奥巴马政府推进伊核协议,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凸显出以色列能够通过美国国内政治渠道影响美国对伊政策方向。<sup>③</sup>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也与以色列长期持续的反对立场和游说活动密切相关。以色列通过所谓“伊朗核档案”等情报操作,为美国退约提供政治与舆论支撑。这种反向塑造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建立在长期偏袒与制度锁定基础上的结构性结果。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美国的对伊政策在相当程度上被其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议程所“劫持”或反向塑造。庇护者美国的宏观战略通过外交解决核问题,被迫让位于依附者以色列所界定的、更富对

---

①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斯蒂芬·M. 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第 5-6、69 页。

②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Dialogue of the Deaf,”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1,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israel-and-the-united-states-a-dialogue-of-the-deaf>,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25 日。

③ “Netanyahu’s Speech before Congress: An Imminent Rift in US-Israeli Relations?,”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Doha Institute)*, March 10, 2015, [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PoliticalStudies/Pages/Netanyahus\\_Speech\\_before\\_Congress\\_An\\_Imminent\\_Rift\\_in\\_US-Israeli\\_Relations.aspx](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PoliticalStudies/Pages/Netanyahus_Speech_before_Congress_An_Imminent_Rift_in_US-Israeli_Relations.aspx), 上网时间:2026 年 3 月 25 日。

抗性的威胁认知。美国领导人虽然长期试图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但由于担心损害更重要的战略利益,对以色列施加实质性限制始终面临较高政治成本。<sup>①</sup> 这种选择逐步将美国锁定在高成本、低约束的安全关系中,使其对以色列的约束工具在政治上越来越难以启用。

近期的高强度地区危机,将这种困境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许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追求的政策,现在危害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以色列不加限制的支持,加上以色列延长对巴勒斯坦人领土的占领……从而增加了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使得华盛顿在应对像停止伊朗核计划那样的其他问题更加困难……这种困境削弱了美国为应对一系列区域性挑战所作出的努力。<sup>②</sup> 2023 年加沙冲突后,美国虽然曾尝试推动停火和限制战争外溢,但总体仍维持对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在 2025 年和 2026 年美以伊冲突中,美国的深度介入既体现了特殊关系的稳固,也使其承担了地区升级、战略资源消耗和国际信誉受损等成本。美国对以承诺因此不再只是维护地区影响力的工具,也成为限制自身政策选择的重要约束。

因此,美以轨道上的“承诺困境”本质上是庇护关系内部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过度制度化和低条件化的安全承诺削弱了其奖惩能力,使以色列从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依附者逐渐转变为能够影响美国政策议程的重要行为体。其结果是,美国在中东面临更高的介入成本和更低的政策自主空间,这构成双轨安全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

## （二）信誉困境：美海网络虚化与伙伴信任流失

如果说美以轨道的问题在于美国因过度承诺而削弱了约束能力,那么美海轨道的核心困境则在于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在“庇护—依附”关系中,依附者的战略配合建立在对庇护者保护能力和意愿的信任基础上。然而,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形成的轮辐式安全网络,本质上是一种以双边合作、基地准入和军售交换为基础的条件性庇护关系,其制度约束力和稳定性弱于美以特殊安全关系。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调整和地区投入下降,这种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逐渐削弱了海湾国家对美国保护能力的信心。

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下滑,首先源于美国对海湾安全保障的长期投入意愿下降与危机情境下临时性军事加码并存,进一步削弱了这一伙伴网络原有的

---

① [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美]斯蒂芬·M. 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第 5 页。

② 同上,第 6 页。

稳定预期。2011 年和 2021 年美军分别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sup>①</sup>成为美国战略收缩的直观表现,其军事存在与武装干预呈持续退潮趋势。自中东剧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主导作用下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则显著增强。美国在平息加沙冲突、劝阻以色列升级冲突、恢复伊核协议、续推“亚伯拉罕进程”等方面均难有作为,其在中东地区的声誉因此持续下降;在加沙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偏袒,也使拜登政府所宣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广泛质疑。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则因在加沙问题上采取高度偏袒以色列、并引发强烈争议的政策姿态而触怒阿拉伯—伊斯兰世界。<sup>②</sup>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美国的安全承诺虽然存在,但其兑现的意愿、力度和优先级都变得难以预测。

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与能源结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疑虑。随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沙特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持久性与稳定性产生怀疑,战略自主意识增强,逐渐认识到单一依靠美国存在较大风险,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sup>③</sup>同时,随着页岩油革命推进,美国对海湾石油的直接依赖显著下降,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相对优先级也有所下移。长期以来,“石油是美国关注中东、介入中东的根本因素”<sup>④</sup>,但页岩油革命和全球战略转移共同改变了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投入意愿的判断。尽管美国在美元体系、能源金融与全球供应链层面仍深度嵌入海湾地区,但在安全供给层面的投入却趋于收缩。海湾国家普遍将这种变化解读为自身在美国安全网络中地位相对下降的信号,其安全依赖的心理基础也因此逐渐松动。当依附者开始怀疑庇护者提供保护的原始动机是否依然牢固时,整个关系的基础便开始松动。

具体的安全危机事件,则检验并放大了这种不信任。2019 年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遇袭事件是一个转折点。面对盟友核心经济命脉遭受的直接打击,美国的反应仅限于外交谴责,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回应。这一事件被海湾国家普遍解读为美国安全承诺弱化的确凿证据。它表明,即便在最需要庇护者展示决心和能力的情境下,美国的保护也可能是缺席或吝啬的。“一个国家战略信誉

---

① “U. S. Completes Troop-Level Drawdown in Afghanistan, Iraq,” *U. S. Department of War*, January 15, 2021, <https://www.war.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473884/us-completes-troop-level-drawdown-in-afghanistan-iraq/>,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3 日。

② 唐志超:《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表征、动因及影响》,载《当代世界》2025 年第 5 期,第 52 页。

③ 李意、唐瑛:《“2030 愿景”框架下沙特阿拉伯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演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36 页。

④ 武星艳:《美国中东军事战略路径依赖的视角》,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3 页。

下降,自然会使盟友对其安全承诺的信赖程度降低,从而导致其同盟弱化。”<sup>①</sup>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海湾国家的危机感,加速了它们寻求安全来源多元化的进程。

更令海湾国家不安的是,美国的安全存在本身正在从“保护伞”演变为潜在的“风险源”。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特别是美伊对抗的升级,美国设在海湾的大量军事基地,从安全的象征变成了可能招致报复打击的目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风险、能源设施的脆弱性,都在高烈度对抗的阴影下加剧。对海湾国家而言,美国安全存在在高烈度危机条件下未必只意味着保护,也可能带来风险输入。

此外,美国在双轨结构内部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袒,进一步侵蚀了其对海湾伙伴的信誉。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有两大目标,即“转移负担,建设和平”。概括起来,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一是“美国优先”,将美国的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反对将美国利益宽泛化解释,强调“聚焦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二是“以色列第一”,强调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并将以色列的利益置于地区其他盟友利益之上,将保障以色列的安全视为核心利益。<sup>②</sup>这种清晰的优先级排序,让海湾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在危机时刻,自己很可能成为被牺牲的次要选项。庇护者在不同依附者之间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公开将一方置于另一方之上,这严重破坏了庇护关系的公平性与可信度,迫使处于次要地位的依附者必须为自己谋划退路。“对主导国来说,向从属国提供过高的安全承诺将大大提高自己的成本,但如果承诺不够则可能导致从属国追求外交的自主性,减少对于主导国的服从。如果无法在两者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可能会对联盟的凝聚力造成冲击。”<sup>③</sup>

面对庇护者承诺可信度的持续流失,海湾国家的理性选择不再是单纯的服从,而是积极的再议价与战略调整。海湾国家一方面,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致力于发展本土国防工业,如沙特推动军事工业本土化计划,试图降低对美国装备和技术的绝对依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多元外交,深化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构建不依赖于美国的替代性伙伴网络。这种“向东看”战略,在经济、科技和外交层面全面展开,其核心目的就是降低对美国单一庇护源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的战略回旋余地。

因此,美海轨道的“信誉困境”本质上源于条件性庇护关系中的信任弱化。

① 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页。

② 牛新春、唐志超、郭长刚等:《中东地缘政治演进与地区秩序重构》,第12页。

③ 徐振伟:《美加联盟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以加拿大对华粮食贸易为核心的考察》,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第139页。

美国安全网络虽然仍然存在,但其凝聚力和约束力正在下降。海湾国家已不再只是接受保护的被动依附者,而是在多元伙伴关系基础上寻求更大议价空间的主动行为体。由此,美海网络逐渐由“强庇护—弱议价”转向“有限庇护—增强议价”,并与美以轨道中的约束失灵共同构成美国双轨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

### (三) 体系困境: 双轨失衡与美国中东安全治理的整体弱化

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差异化承诺的等级化庇护体系。美国通过对以色列提供高度制度化的特殊支持,塑造核心战略伙伴;同时通过轮辐式安全网络管理海湾国家,以较低成本维持地区影响力。然而,这种结构的稳定运行依赖于美国协调不同伙伴利益的能力。当两条轨道内部关系发生异化,并在地区危机中相互交织时,差异化庇护模式本身便转化为美国治理能力下降的重要来源。

这种体系困境的根源,在于两条轨道上的治理失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传导、彼此强化。在美以轨道上,美国因过度庇护而丧失了约束以色列的能力,其战略自主性被严重侵蚀,不得不为依附者的单边冒险行为承担高昂的地缘政治与道义成本。在美海轨道上,美国因承诺的条件性与不确定性,持续损耗着作为庇护者的战略信誉,促使海湾依附者加速寻求战略自主与外部对冲。问题在于,这两条轨道上的风险会相互外溢。美国对以色列的明显偏袒,会被海湾国家解读为自身在美国安全序列中处于次要地位的证据,从而加剧其对承诺可靠性的怀疑。反过来,海湾国家因不信任而采取的多元化举措,如引入中俄装备,又会削弱美国通过传统军售等手段施加影响的能力,间接助长了以色列在安全上的“例外”心态。因此,美国面临的并非两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其差异化庇护策略在动态互动中产生的合成性危机。

外部替代性选择的出现,进一步动摇了这一庇护体系的根基。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能源、基建和数字领域深化与海湾国家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借助军售、能源协调和叙利亚介入重塑地区存在,海湾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回旋空间。依附者的行为逻辑从来不是盲目追随,而是在安全需求与自主性收益之间进行精明的权衡。从结盟动因看,弱国并非简单追随强者,而是在安全需求与自主收益之间进行策略性权衡。<sup>①</sup> 当外部有了可信的替代选项,依附者对原有庇护者的依赖和服从便会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在继续维持对美安全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与中、俄、欧的关系,正是这种对冲策略的体现。这直接削弱了美国通过安全供给来实施“分而治之”或“区别对待”的控制力,使其在协调不

---

<sup>①</sup>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18.

同依附者利益时面临更大的议价压力。

核与军售这两个高敏感领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在维持体系平衡上的两难。面对伊朗的核进展,沙特、阿联酋等国不仅要求美国提供更坚实的延伸威慑,还公开追求自身的和平核能权利,甚至以此作为对美关系的筹码。2023 年美国在一定条件下对沙特核合作立场的松动,<sup>①</sup>便是一个例证。这反映了庇护者的困境:若拒绝提供核保护,依附者可能寻求独立核力量,导致体系失控;若提供保护,又可能鼓励依附者采取更冒险的政策,将庇护者拖入冲突。“一方面,如果不对盟国提供核保护,盟国可能会自行寻求发展独立的核力量,这将会增加联盟约束的困难和联盟分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对盟国提供核保护,又可能使得盟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增加‘被牵连’的联盟困境”<sup>②</sup>。同样,在军售领域,海湾国家一方面继续采购美制装备,另一方面也积极引入俄制防空系统<sup>③</sup>和中国无人机平台<sup>④</sup>,并大力推进国防工业本土化。军售从美国约束盟友的工具,蜕变为维系脆弱关系的赎买手段。美国国会对海湾军售的辩论亦反映了这一现实:“如果我们愚蠢地取消与沙特阿拉伯的这些合同,俄罗斯和中国将成为巨大的受益者。”“我们不希望(中东的美国伙伴)转向中国,我们不希望他们转向俄罗斯购买那些系统。”<sup>⑤</sup>

地区中等强国自主性的增强,则从另一个维度加剧了协调的复杂性。土耳其、伊朗乃至沙特、阿联酋等国,都在地区事务中展现出更强的自主意志。依附者并非完全被动,它们可以通过提供关键基地、配合特定政策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对庇护者的必要性,从而争取更多自主空间。弱国可以通过提供基地、政策协

① “Saudi Arabia Announces Crucial Step Forward in Its Nascent Nuclear Power Plans,” *CNBC*-September 26,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9/26/saudi-arabia-announces-step-forward-in-its-nascent-nuclear-power-plans.html>,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28 日。

② 凌胜利:《联盟研究:理论与案例》,第 44 页。

③ “Saudi Arabia Spends US \$ 2.3 Bln to Acquire 39 Russian Pantsir-S1M Air Defense Systems in Secret Deal,” *Defence Security Asia*, January 25, 2025, <https://defencesecurityasia.com/en/saudi-arabia-reportedly-acquires-39-russian-pantsir-s1m-air-defense-systems-in-secret-deal>,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④ “Saudi Air Force Acquires Chinese Wing Loong-10B Reconnaissance-Strike Drones,” *Defaiya*, February 14, 2024, <https://www.defaiya.com/news/Defense%20News/Asia/2024/02/14/saudi-air-force-acquires-chinese-wing-loong-10b-reconnaissance-strike-drones>,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⑤ “Arms Sales in the Middle East: Trends and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4984,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4984#\\_Ref47948432](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R44984#_Ref47948432), 上网时间:2026 年 8 月 2 日。

调等方式提升对强国的必要性,从而在依赖中争取更多议价空间。<sup>①</sup> 这意味着,美国对不同轨道成员的绝对主导权正在下降。当这些国家的政策与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双轨结构的内部裂痕便会公开化,其协调不同依附者的成本急剧上升。

2025 年 9 月,卡塔尔遭以色列空袭事件成为对美国双轨安全结构的一次压力测试<sup>②</sup>。尽管相关细节仍缺乏充分公开证据,但在美以高度安全协同的结构背景下,该事件客观上暴露出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机制缺位,并引发外界对其庇护选择性的广泛质疑。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关键节点及“非北约主要盟友”<sup>③</sup>,卡塔尔安全本应处于美国庇护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中。然而,袭击事件暗示,当以色列的安全偏好与海湾伙伴的安全发生冲突时,美国的保护伞出现了明显的“选择性”。这一事件将两条轨道上的困境戏剧性地联结在一起:它既是美以轨道上美国约束失灵,未能阻止以色列行动的恶果,又瞬间引爆了美海轨道上长期积累的信任危机,海湾国家目睹盟友遭袭而美国反应乏力。这些都表明海湾国家正在基于对庇护可靠性的重新评估,加速调整自身的安全策略。

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所面临的“体系困境”,是其差异化庇护治理模式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对以色列的过度庇护侵蚀了庇护者的约束权威,对海湾的条件化承诺损耗了庇护者的战略信誉,两者在地区危机中相互叠加、共振。同时,外部大国的替代性选项和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崛起,不断侵蚀着美国维持这一体系所需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结果是,原本设计用于低成本管理复杂地区的双轨结构,已经演变成一个高成本的协调负担和风险放大器。美国不仅难以有效调和以色列与海湾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其自身也深陷于因承诺失衡而导致的整体权威弱化与政策被动之中。这标志着美国通过非对称庇护体系主导中东安全秩序的时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

综上,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具体治理困境,呈现出清晰的递进与联动关系:在最直接的双边层面,美国在美以轨道上陷入“承诺困境”,其约

---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 910.

② “Qatar Denies White House Claim Trump Sent Warning Before Israel’s Attack,” *Al Jazeera*, September 9,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9/9/white-house-says-trump-notified-qatar-ahead-of-israeli-strike-on-hamas>; “Trump Response to Israel’s Qatar Attack Undermines US Credibility: Analysts,” *Al Jazeera*, September 11, 202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9/11/trump-response-to-israels-qatar-attack-undermines-us-credibility-analysts>, 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22 日。

③ 参见唐志超:《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环境塑造与秩序重建》,第 22 页。

束盟友的能力弱化,战略自主性受损,不得不为以色列的单边行动承担高昂成本;在美海安全伙伴网络层面,美国在美海轨道上遭遇“信誉困境”,其安全承诺的条件性与选择性侵蚀了海湾伙伴的信任,驱动后者加速离心。最终,在整体架构层面,两条轨道的异向张力相互叠加、传导,导致了“体系困境”:美国难以协调不同盟友的冲突性利益,其差异化治理的逻辑在危机中暴露出内在矛盾,致使其中东安全治理的整体效能出现系统性弱化。理解这三重困境的生成与互动,是把握美国中东霸权当前窘境与未来走向的关键。

#### 四、结语

美国中东双轨安全结构的内在困境,源于其制度化的“庇护—依附”关系设计与现实权力动态的脱节。在美以轨道,美国长期、制度化且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在巩固同盟的同时,也严重弱化了其对以色列的行为约束能力,导致后者得以通过美国国内政治渠道反向塑造其政策议程,使美国在享受战略资产便利的同时,频繁为盟友的单边行动承担高昂的连带成本与战略风险。在美海轨道,美国安全保护的高度条件性、工具性及战略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则持续侵蚀其承诺可信度,促使海湾国家从被动依赖转向以多元化外交和战略自主为特征的主动应对,这削弱了美国主导安全网络的凝聚力。更为关键的是,两条轨道困境相互传导、彼此强化。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加剧了海湾国家对其承诺公正性的怀疑,而海湾国家的担忧又削弱了美国协调盟友、维持整体架构稳定的能力,使美国在危机中陷入既难以约束核心盟友、又无法安抚关键伙伴的双重被动。

展望未来,深厚的国内政治根基使美以关系呈现强大惯性,危机往往使其加固,但代价是美国战略负担的持续加重;美海关系则将进一步向功利化、议题化方向演进,成为一项更不稳定、更具交易色彩的合作安排。最终,美国维持该体系的综合成本将持续攀升,但其有效整合盟友、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力却在不断衰减,这标志着美国通过非对称庇护体系主导中东安全的模式,其效能正步入一个难以逆转的衰退期,地区格局将加速向一个更加多极、多元和充满竞争的新阶段过渡。

(责任编辑:赵 军 责任校对:李 意)